

再造華美女性文學傳統： 任璧蓮的《夢娜在應許之地》*

馮品佳

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
E-Mail: pcfeng@cc.nctu.edu.tw

摘要

華美女性文本母親的主題屢見不鮮，形成具有歷史意義的華美女性傳統。本篇論文將《夢娜在應許之地》置放於華美文學傳統的創造與其他華美女性文本脈絡中，討論母女主題的縱軸發展，並研究文本中有如「彩虹聯盟」的橫向社群，如何一方面反應美國民權運動族裔平等的政治理念，以文化混雜對抗主流文化之霸權，並經由角色族裔性之不斷變身質疑族裔與文化的道地性；另一方面則思考族裔之間團結之可能。任璧蓮以帶著嘲諷但包容的慧黠，一面化解母女衝突，一面發展不同族裔之間的關係性政治，提供帶著希望的喜劇視域，為華美女性小說開創喜劇傳統。

關鍵詞：華裔美國文學、女性文學傳統、關係性政治、任璧蓮、《夢娜在應許之地》

* 本文承兩位審查人予以詳盡指教，對於筆者修改論文助益匪淺，謹此致謝。
投稿日期：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九日。
責任校對：陳雪美、簡秀文

華裔美國人，當你們試圖了解身上哪些是中國時，你們怎麼把童年、貧窮、瘋狂、家庭和用故事來標示你們成長的母親等特殊事物，與中國區分開來？什麼是中國傳統？什麼是電影？

(Kingston, 1976: 6, 此處參考張小虹譯文)

手中茶杯輕輕一頓，海倫繼續言道：「妳是女兒。女兒。妳還記得什麼是女兒嗎？」

「我記得。」

「妳是誰？」

「我是妳的女兒。」

(Jen, 1996: 45)

本文開始的兩段引言，其一引自湯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的《女鬥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引文清楚標示出華裔女兒屬性位置之猶疑未定；而引自華美女作家任璧蓮 (Gish Jen) 第二部小說《夢娜在應許之地》(*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1996) 的對話，則清楚呈現母女之間充滿張力的關係。由《女鬥士》到《夢娜在應許之地》前後二十年間，華美女性文本母親的主題屢見不鮮，形成一個具有歷史性及歷史意義的華美女性傳統。在《夢娜在應許之地》中，對於移民母親與第二代女兒之關係的思索，構成貫穿世代的縱軸發展。同時，喜歡書寫「危險話題」的任璧蓮 (Satz, 1993: 140)，在充滿實驗精神的《夢娜在應許之地》中，除了發展母女互動的傳統主題之外，也選擇一個禁忌性的主題，描寫主角夢娜如何拒絕被(父)母親血統決定族裔性，決心「變身」(switch)為猶太人的故事。¹ 在一九六 年代末、七 年代初的背景中，任璧蓮為身處

¹ 在莎茲 (Martha Satz) 與任璧蓮的訪談中，任璧蓮解釋她喜歡「淘氣的」(wicked) 的題材：「意思是寫一些別人認為不該寫的東西」。任璧蓮的例子是族裔「變身」、性、種族主義、權力等題材，其危險有如「地雷區」，但是作家仍需義無反顧地書寫 (Satz, 139-140)。

青／少年期，家住紐約猶太郊區斯卡斯海爾(Scarshill)的夢娜創造了跨越性別、族裔與階級的「玩伴」，藉此為探索華裔女性屬性的小說文本插入橫向社群(horizontal community)的面向。而任璧蓮一貫幽默的手法，在《夢娜在應許之地》中配合高度口語化的美式英語發揮得淋漓盡致，為華美女性文學注入幽默的血液，也為華美女性小說另闢蹊徑，開創喜劇的傳統。

本篇論文將嘗試探討任璧蓮如何以《夢娜在應許之地》創新華美女性文學傳統。論文首先將《夢娜在應許之地》置放於華美文學傳統的創造與其他華美女性文本脈絡中，討論母女主題的縱軸發展。其次研究夢娜有如「彩虹聯盟」(rainbow coalition)的橫向社群，²如何一方面反應美國民權運動族裔平等的政治理念，以文化混雜(cultural hybridity)對抗主流文化之霸權，並經由角色族裔性之不斷變身質疑族裔與文化的道地性(authenticity)；另一方面則以此「聯盟」之不可長存，思考族裔之間團結之可能性。筆者將提出任璧蓮如何以帶著嘲諷但包容的慧黠，一面化解母女衝突，一面發展不同族裔之間的關係性政治(politics of relationality)，提供帶著希望的喜劇視域，再造華美女性傳統。

壹、華美女性文學傳統與母女情節(結)

在正式討論《夢娜在應許之地》之前，必須先釐清華美女性文學傳統之建構與母女情節盛行之文化社會因素，藉此為任璧蓮之文

² 審查人指出「彩虹聯盟」為非裔領袖傑克遜(Jesse L. Jackson)在一九八四、八八年兩次競選總統時提出之政治口號，其意識形態為集合「有色人種」，抗議白人的二元對立。此處將夢娜包括白人的橫向社群比為「彩虹聯盟」或許並不完全符合此一名詞的意識形態，但是筆者主要在於強調其成員之雜，代表美國不同族裔、不同少數民族之集結，故而在不考慮「有色人種」與白人的二元對立，仍舊挪用「彩虹聯盟」的名稱。

本建立其脈絡。究竟什麼是文學傳統的創造？³ 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在討論 (英國) 女性文學傳統的《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 中說道：「傑作不是無中生有，它們是多年來眾人共同思考的累積結果，因此一人的聲音代表有廣大群眾的經驗」(1945: 66)。在華美文學傳統的創造過程中，由於獨特的移民歷史及文化背景，較主流文學傳統之形成更加複雜。李磊偉 (David Leiwei Li) 指出，一九六、七 年代華美文學傳統冒現之際，華美作家肩挑有雙重負擔——必須要又「破」又「立」——既要顛覆植基於東方主義思維的「美國東方主義論述」(American Orientalist discourse)，又要重新建構華裔美國傳統(1992: 323)。華裔美國女性文學傳統的創造，除了對抗主流文化之東方主義論述之外，也需要面對族裔文化中強烈的父權意識。⁴ 在吳爾芙以族譜模式建築女性文學傳統理論中，前後世代的女作家們形成母女相傳的母系傳承 (matrilineage)。諸多族裔女作家如非裔的華克 (Alice Walker)，也以找尋「我們母親的花園」象徵對於母系藝術傳統的追求。回顧華美女性文學傳統創造過程，隱然也可勾畫出一母系傳承。雖然早期華裔女性受制於美國排外法案限制入境、人口稀少，文學創作極為沈寂，二十世紀自

³ 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和藍格 (Terence Ranger) 編輯的《創造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一書特別凸顯傳統的重複性及與過去之接續性乃是人為建構，而「創造出來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s) 一詞，也在學術領域中流通。霍布斯邦定義如下：“‘Invented tradition’ is taken to mean a set of practices, normally governed by overtly or tacitly accepted rules and of a ritual or symbolic nature, which seek to inculcate certain values and norms of behaviour by repetition, which automatically implies continuity with the past” (Hobsbawm & Ranger, 1983: 1)。

⁴ 林玉玲 (Shirley Geok-lin Lim) 指出亞美文學是男性主義觀點與女性主義抗爭的活躍場域；而她所分析的亞美女性文本——如黃玉雪 (Jade Snow Wong) 的《五女》(*Fifth Chinese Daughter*)、金蓉揚 (Kim Ronyoung 音譯) 的《土牆》(*Clay Walls*) 及若月 - 休斯頓 (Jeanne Wakatsuki Houston) 的《曼茲那之外》(*Beyond Manzanar*)——皆顯示作者試圖協調互相衝突之族裔與性別屬性的掙扎 (1993: 572)。

伊頓姊妹 (the Eaton sisters) 以降，華裔女性創作在多重艱難之中逐漸冒現，自從《女鬥士》於一九七六年出版之後，切入主流文化的場域，二十多年來在新舊女作家辛勤筆耕之下，至今可謂粲然有成。華美女性文學日益廣受歡迎，華美女作家以其特有文化及歷史獨特性，在美國文學中逐漸爭佔一席之地。誠如林英敏 (Amy Ling) 所言，當今亞美文學典律冒現，時值亞美文學與藝術之「復興」期，而亞裔女性在此文藝復興中扮演極其傑出、甚至主導的角色 (1991: 192)。近一世紀以來華美女性作家社群有其不同之光譜：包括出生地不同 (生於中國的華裔移民或生於美國的第二代華裔) 及血統分歧者 (父母皆為華裔或歐亞混血)。早期華美女作家書寫主題範疇也各異，林英敏歸納有三：喜愛說故事，且時常摻雜對過去之懷思；抗議種族與性別之不平待遇；以及進行語言或結構之實驗性書寫 (1990: 220-221)。這些主題在林玉玲所謂的一九七〇年代以來亞美文學的「新傳統」中依然出現 (Lim, 1993: 573)。

若就一九七〇年以來在學界及大眾消費空間廣受好評的華美女性小說而言，母女情結可謂時時湧現的情節。湯亭亭為華美女性文學的奠基之作《女鬥士》將第二代華裔女兒的屬性建構，置放於家族中不同母性角色——母親、姑母、姨母——的脈絡中。主流市場的寵兒譚恩美 (Amy Tan) 筆下更是脫離不了母女關係的鋪陳：譚恩美成名之作《喜福會》 (*The Joy Luck Club*, 1989) 以四對華裔母女的錯綜情節烘托移民母親與美國女兒的母系傳承；《灶君娘娘》 (*The Kitchen God's Wife*, 1991) 更聚焦於一對母女，以虛構的方式重寫譚母的親身故事；在《百種神秘感覺》 (*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1995) 中，譚恩美以混血女主角同父異母的中國姊妹代替白人母親，寫出亞、美兩洲兩世輪迴的奇幻故事，但依然未能脫離母女情節的架構。伍慧明 (Fae Myenne Ng) 的《骨》 (*Bone*, 1993) 文本的主軸固然

在於書寫華埠歷史，⁵ 其中女兒對於移民母親過去的回顧，不但補足早期華埠「光棍社會」(bachelor society) 中女性故事的缺無，也凸顯母親是華裔女兒與華裔美國社群相連的臍帶。

華美女性傳統中母女主題的興起，自有其特殊之社會歷史脈絡。一九七〇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諸多成就之一，就是使得長期在父權文化宰制之下遭到邊緣化的母系傳承得以重見天日，甚至成為女性追求自覺的必要條件；而母女情節也成為女性書寫傳統中重要課題。由現實的層面而言，在大眾讀者消費市場暢銷的經常也是刻劃華裔母女關係的文本。而華美女性傳統中的母女情節廣受歡迎，以及專門書寫母女關係的作家如譚恩美者大賣的理由，正如黃秀玲 (Sau-ling Wong) 所言，一方面是華裔女性文學傳統中對於母女關係的共同關切，一方面則是白人主導讀者群 (包括女性主義讀者) 亟需「她者」作為觀照異同的一種意識形態訴求 (Wong, 1995: 177)。⁶ 因此華美文學中母女情節的歷史與文化獨特性，極有可能在主流閱讀的消費行為中遭到抹殺。例如《喜福會》的高度市場價值，就遭評論者解讀為是譚恩美以女性論述包裝種族論述，避免造成主流 (白人) 讀者之不安。文本中母女的文化距離化解之道，不在於面對不同的文化價值之衝擊，而在接受超越代溝的母系傳承。而喜福會的母親們被塑造為女兒內心的「中國」所在與中國文化的傳遞者 (Bow, 1994: 236-237)。黃秀玲也認為雖然《喜福會》時有反東方主義的姿態 (counter-Orientalist gestures)，然而仍可能落入「自我東方

⁵ 駱里山 (Lisa Lowe) 認為《骨》主要在書寫空間 (space)，藉由華埠此一「她者」社會空間的製造與再製造，閱讀過去一世紀以來亞美社群之冒現與所遭受的障礙 (1996: 120)。

⁶ 母女情節的基本特點有五：(1) 女兒發現自己的聲音不完全為自己所有；(2) 女兒發覺真正認識母親的重要；(3) 女兒對於母親力量的驚訝與佩服；(4) 女兒意識到尋回母系傳承的需要；(5) 然而女兒也會對於母親負面傳承感到憤怒與絕望 (Nan Bauer Maglin, qtd. in Wong, 1995: 176-177)。

主義化」(self-Orientalizing)的陷阱，與女性主義讀者構成一種「糖姊情誼」(“sugar sisterhood”) (Wong, 1995: 181)。⁷ 因此華美女性作家在處理母女情節時有其潛藏之危險與多重之困難。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探討與自身主體性及意識建構息息相關的母女關係，而又不曾陷入「自我東方主義化」，淪為人類學研究中理想的「道地」(authentic)異國文化代表？

任璧蓮的第一本小說《典型美國人》(*Typical American*, 1991)重心放在華裔移民父母一代，以父親張若夫(Ralph Chang)的觀點看待同化、屬性建構的問題；在刻劃女兒成長的《夢娜在應許之地》中，則以母女情節貫穿世代互動之縱軸發展。《典型美國人》的女性必須刻意消弭自我，好讓男人保持尊嚴。任璧蓮特意強化女性為維護男性尊嚴所做的身體與心理雙重犧牲，藉此暴露父權思想中男尊女卑之不合理要求，以間接手法質疑男性中心思想。⁸ 《夢娜在應許之地》將意識樞紐移轉至二女夢娜，一方面顯示兩代之間故事的接力，一方面則以女兒的觀點替代父親，接收父權的發言權與思考權。任璧蓮在這部女兒的文本中所面臨的挑戰，就在於如何經營母女情節，而不落入二元對立性的文化衝突窠臼。而她使用的策略是一方面沿用華美女性傳統中對於母女情節的重視；一方面則拒絕移民母親／美國女兒的二元對立性，以美國化的母親解構「母親」與「中國」的等號關係，對抗本質性的東方主義思維，使得女兒不至

⁷ 黃秀玲此一名詞之發明，來自《灶君娘娘》中譚恩美誤將「堂姊」之音譯為「糖姊」(tangje)，為譚一連串文化語言「誤譯」之一 (Wong, 1995: 180-183)。

⁸ 《典型美國人》男性觀點主控，而家庭中其他女性如姊姊泰瑞莎 (Theresa) 及妻子海倫 (Helen) 皆須順應其男性優越心態，處處故意貶低自己以襯托若夫一家之主的地位。文本中任璧蓮以「睡覺」的象徵手法表達若夫的逃避現實傾向，他數次真睡或象徵性的睡眠——如中國大陸赤化後無家可歸、求取博士學位不順、炸雞店倒閉之時——都仰賴外號「百曉」的大姊喚醒。泰瑞莎為弟弟犧牲的結果，卻被若夫譏為不知廉恥的「臭蛋」(rotten egg)，甚至幾乎成為植物人。

淪為主流讀者的替代品，經由母親了解中國。⁹ 她也呈現凱莉 (Callie) 與妹妹夢娜之間的不同性格及與母親的不同關係，但又拒絕以好女兒 / 壞女兒的兩立對照方式塑造張家二姊妹。

文本中的兩代關係與傳統女性成長小說的情節發展大致相合：夢娜的成長情節與母女疏離平行發展；而文本最後一頁的母女和解，也複製傳統母女情節的結局。這種傳統情節的使用或許陳舊 (cliched)，但是顯露尊重華美女性傳統中對於母親的重視，也為諸多「變身」的文本製造一種穩定感，保留文本結尾回歸應許之地——亦即為父母接受、重返家庭——的希望。

海倫與夢娜的世代衝突，源自夢娜私下皈依猶太教，變成「信奉天主教的華裔猶太人」(Jen, 1996: 44)。論文引言中海倫展現權威式的態度，以教義問答的 (catechist) 方式，教導夢娜親族階級觀念，試圖鞏固中國家庭倫理的基礎，同時更凸顯母女親緣的恆定性。然而夢娜雖承認是母親的女兒，但是在下文緊接著否認自己中國人的屬性，顯示海倫複製傳統中國女兒的嚐試失敗。自此原本最得海倫偏愛的夢娜與母親漸行漸遠，導致母女關係決裂，直到夢娜婚禮之日才與母親重聚。

然而任璧蓮也抗拒譚恩美式將移民母親本質化為中國的東方主義論述。海倫已不是《典型美國人》中弱不禁風、只願長依父母膝下的海藍 (Hailan)；也不是為了維護丈夫尊嚴，不敢承認隻手修復暖氣爐的小妻子；更不是被丁苟弗 (Grover Ding) 以物質享受及中式早餐欺哄、或被丈夫推出二樓窗外的出牆紅杏。《夢娜在應許之地》中的海倫雖然教訓女兒中國倫常，卻取代丈夫成為「家庭中的中流砥柱」，體罰凱莉時足可讓後者一個月不能上體育課的強勢母親。雖然海倫怨恨若夫不能像傳統中國丈夫一樣肩擔家庭的責任，

⁹ 黃秀玲評論譚恩美筆下的華裔女兒功能代替主流讀者了解母親所代表的中國，滿足其偷窺式的好奇心 (Wong, 1995: 197)。

但仍然以自己的能力自豪 (Jen, 1996: 46)。從海倫辛苦維持一再被撞毀的花園到家庭餐館事業的擴張，可見她追求的是郊區中產階級有屋、有車、有事業的「典型美國人」——或是「張基」(Chang-kees) 式——的生活。¹⁰ 從中國的海藍到美國的海倫，文本中的母親已經歷「變身」，也再造了自身的族裔性。¹¹ 此處母親的變身是屬於同質化的，尋求與美國中產階級主流之「同化」(assimilation)，而迥異於湯亭亭、譚恩美筆下固守中國傳統的母親形象。由此也可得見不同世代華裔作家對於母親的族裔與階級屬性之不同處理方式。

同時任璧蓮也從語言層面顛覆一成不變的中國性。例如凱莉想要重新尋根，在哈佛學得北京話，回家卻無法與來自上海的父母以他們的「母語」溝通，這才發現「原來老爸老媽不只說英文帶口音」(Jen, 1996: 129)。這種對於中國不同地域文化與語言差異的認知與敏感，遠超過譚恩美式不分大江南北、約化「中國」的單一性與本質主義。

任璧蓮也在母女情節中插入姊妹問題。大姊凱莉循規蹈矩，是哈佛的優等生，由厭惡中國到擁抱族裔傳統，為照顧父母而習醫開業；小妹夢娜自小受到海倫寵愛、古靈刁鑽，反應一九六〇、七〇年代追求自由的精神。直到夢娜在自己失寵之後，才體驗到凱莉從小因為母親偏心所受之苦。有如豬羊變色，開心果的夢娜成了背叛家庭忠誠、指責父母種族歧視的危險份子；凱莉則由冷宮釋出，變為好女兒的模範。然而好／壞女兒真的如此涇渭分明嗎？夢娜蹣跚到哈佛投奔凱莉，卻不知姊姊去向。夢娜不禁感嘆：「現在到底誰

¹⁰ 「張基」是《典型美國人》中若夫自創的名詞，綜合張家的中國姓氏與美國著名的洋基棒球隊 (the Yankees) 隊名 (Jen, 1991: 127)，代表對於主流文化之認同與追求，以及其屬性之雜化。

¹¹ 但海倫的美國化也並非全然脫離中國。由《典型美國人》開始，她便年復一年寄信給身陷大陸的父母，表現對於父母故國戀戀不捨，直到《夢娜在應許之地》尾聲時才得知父母逝世。

是好女兒？誰是壞女兒？海倫如果知道夢娜沒有失蹤，不見蹤影的卻是她的哈佛高材生，又會作何感想？」(Jen, 1996: 265)。而且凱莉的族裔意識是否就使她成為海倫所要的理想女兒呢？反諷的是凱莉的中國意識是經由黑人室友娜娥蜜 (Naomi) 的啟蒙，深受當時亞美運動的影響。在民權運動思潮的衝擊下，凱莉表現的比移民父母的更樣板、更「中國」——如凱莉所謂「做這種中國人與那種中國人不同」(“there is being Chinese and being Chinese”) (Jen, 1996: 167)。最後連父母都受不了終日身穿棉襖、足登布鞋、回歸中文名字開蘭 (Kailan) 的凱莉 (Jen, 1996: 301)。

駱里山指出亞美小說經常以「家庭敘事」(family narrative)、世代衝突的方式再現「始源」文化 (“original” culture) 的喪失或傳遞 (Lowe, 1996: 62)。她反對這種缺乏政治性、將亞美文化同質化為世代階級與家庭關係的「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s)，因為

僅就世代衝突與子女之道的大敘事來詮釋亞美文化，會使亞美文化本質化，模糊了階級與性別的特異性與不同之標準，以及亞洲人不同的國族性。將亞裔美國人種族化及族裔化之社群所持的文化政治約化為第一代／第二代的掙扎，以私人化的家庭對立代替社會差異。這些約化行為促使亞美文化差異遭到美學式的商業化，同時也否認移民歷史中實質存在的排除異己與差異化舉動。(Lowe, 1996: 63)

駱里山建議要以「橫軸式」(horizontal)的關係與「縱軸式」(vertical)的世代模式共同討論，藉以呈現亞裔美國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混雜性與多元性 (Lowe, 1996: 63-64)。

駱里山對於亞美文藝中家庭敘事過盛的疑慮，自有其實質性的考量與根據。然而筆者認為也應考量各個作者如何處理世代情節。例如伍慧明在處理世代問題時重心拿捏適當，以整個華埠的歷史文化為脈絡，將家庭敘事作為華埠歷史敘事的層面之一，而非全部。

黃秀玲也指出湯亭亭在《女鬥士》中採取「質疑性的形式」(interrogative modality),¹² 不斷自我解構,其修辭比喻(trope)為「翻案式」(palinode)的取消自己的言論;另一方面譚恩美的《喜福會》則呈現「陳述性的形式」(declarative modality),使得母親對於中國的描述顯露毫無疑問的真確(Wong, 1995: 195)。湯亭亭與譚恩美之間對於母女情節處理的複雜性由此可見高下。

母女情節在華美女性文學傳統不可否認地有其重要性。至於如何在傳統中創新,實則依賴華裔女性作家各自展現個人才華。至於任璧蓮在書寫《夢娜在應許之地》中的母女情節時,也將此情節置放於夢娜對於自身屬性質疑試探的敘事中,為夢娜成長過程的重要因素之一。任璧蓮對於母女情節創新之處,在於文本中母親雜化的屬性也使他無法成為「中國」的權威性代表,反而更傾向與美國中產階級主流之同化及同質化的變身。而文本中兩個女兒則與母親背道而馳,選擇相對於主流之異質化變身。而且兩姊妹不同的種族屬性選擇——姊姊走向本源的(nativist)亞美模式,妹妹則另創張格維茲(“Changowitz”) (Jen, 1996: 56) 式的中國猶太身份——更凸顯同一家庭中種族政治錯綜複雜的運作。凱莉與夢娜之間的姊妹問題使得家庭敘事更多向化,為世代情節添加橫向的同代發展。母女三人由相同的階級背景出發,各自建構不同族群性的應許之地,更使得縱橫兩軸交錯,世代情節與種族、階級論述結合,走出傳統的華美母女情節(結)。

貳、創造橫向社群

在同世代之間橫向社群的建構上,《夢娜在應許之地》似乎直

¹² 此一名詞為黃秀玲借自巴特勒—伊文斯(Elliott Butler-Evans)對於《女鬥士》的評論。

接反應駱里山的論點。¹³ 文本中除了凱莉與夢娜姊妹之間的互動之外，夢娜在「實驗」自己族裔屬性時與同輩之間的橫向關係不可勝數：例如要求她「變身」為日本新娘的日本小男友修門 (Sherman Matsumoto)；夢娜皈依猶太教後參加的聖堂青年團契 (Temple Youth Group)；夢娜十三歲加入猶太教後的手帕交芭芭拉 (Barbara Gugelstein) 及男友賽斯 (Seth Mandel) 組成的三人行；羅德島上避暑勝地與凱莉、娜娥蜜、艾露易絲 (Eloise Ingle) 等人為反抗壓迫者 (oppressors) 而成立的「表達者」(Expressers)；以及在芭芭拉家所設立的葛家夏令營 (Camp Gugelstein) 等等。其中葛家夏令營極具政治理想色彩，打破種族、階級與性別藩籬，儼然是小型「彩虹聯盟」，最為激進，不但反應文本七十年代的歷史時空，及美國民權運動前後種族平等的訴求，也表達夢娜等人少年的理想精神，值得探討。

葛家夏令營的起源來自鬆餅店的非裔二廚艾斐得 (Alfred) 被妻子掃地出門，無家可歸。芭芭拉讓艾斐得遷入父母遠遊的葛宅。艾斐得不但呼朋引伴，招來非裔友人，並與芭芭拉的堂姊依薇 (Evie) 同居，再加上芭芭拉與賽斯，一個涵括黑、白、黃人種，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有男有女的團體於焉成立。他們共同的活動混雜各族文化：在室內聽黑人音樂、打麻將、下棋、打乒乓、撞球、甚至一同做瑜伽，在室外打籃球、棒球、網球、羽毛球、游泳，更慣常做政治議題的討論——諸如種族合併 (integration) 好？還是隔離 (separatism) 好？金恩博士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基督教愛是否足以補救種族等問題。葛家夏令營儼如嬉皮文化盛行時的理想公社。誠如夢娜對於營中成員的感觸：雖然不久前他們彼此只是陌生人，「但是現在，直截了當的說，他們已經成了朋友！難道他們不是夢娜所認識的人當中最有趣的嗎？難道他們不是一群哥們嗎？」(Jen,

¹³ 當然在其他文本中也有橫向社群的建構，例如《骨》中的三姊妹及華埠社群，《猴行者》(Tripmaster Monkey, 1989) 中男主角遭遇的不同群體等。

1996: 203)。夢娜感動之餘，在交心時刻不禁說出父母有歧視艾斐得之意，卻種下日後離家出走的禍因。

葛家夏令營卻有潛力實現金恩博士倡導的「救贖之愛」(“redemptive love”) (Jen, 1996: 201)，也有潛力成為傅柯 (Michel Foucault) 所謂的「異質空間」之一 (“heterotopias” qtd. in Lowe, 122)，為她者性的空間，足以質疑其他社會空間中的階級化組織。傅柯的異質空間，根據駱里山解讀

為危機或離經叛道之所在(監獄、精神病院或墓園)或只是將不相容的空間或時空並置的所在(慶典、博物館或殖民地)。異質空間的功能在於與二元對立空間保持批判性的關係：它們暴露硬將空間階級化地劃分為公與私、娛樂與辦公、合法與不合法之不同領域的不合理。(Lowe, 1996: 123)¹⁴

葛家夏令營的成員來自不同族群與職業——高中生、廚子、嬉皮、越戰榮民、建築工人、法律系學生，及以抗議種族歧視為專業者——具有高度之異質性。他們之所以能聚集一堂，也是美國諸多歷史論述交織的結果：非裔成員為黑奴買賣與蓄奴制度遭強迫遷徙的黑奴後代；猶太裔的成員是德國屠殺猶太人(Holocaust)時難民的後裔；而亞裔的夢娜則代表亞洲政局變異與美國夢意識形態等多重牽引下的新移民。這種「雜種」組合象徵部份的美國國家組合(national formation)，同時也對於主流文化藉著以種族與階級隔離保持特權的心態及行為提出挑戰。將此異質空間置放在文本的歷史脈絡之下，更可感受民權運動的歷史與社會意義。賽斯的金恩式夢想空間——「一個沒有隔間牆的房子」(“a house with no walls between

¹⁴ 駱里山認為《骨》中的華埠可視為一種異質空間：既是遭主流文化陋巷區隔(ghettoized)的非主流空間，也是抗拒的位置，代表在國家空間中「她者」之內化(Lowe, 1996: 122)。

the rooms”) (Jen, 1996: 208)——勾畫出理想美國的藍圖。他對於這個夢想十分著迷，甚至興沖沖買了一件套頭的非洲上衣 (dashiki) 當作他的營制服。但是正如許多美國夢終究變成噩夢，賽斯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天真：「他們當我是個種族歧視的狗雜種，我卻當他們是朋友」(Jen, 1996: 207)。

葛家夏令營或許具有巴赫汀 (M. M. Bakhtin) 「嘉年華式」(carnavalesque) 的精神，具有顛覆主流論述的能力。然而任璧蓮的文本邏輯依循物極必反、盛極必衰的原則進行，葛家夏令營終究只是曇花一現，此一建立在種族和平共存理想的團體，隨著假期的結束在互責種族主義聲中崩潰。導致其分崩的原因是芭芭拉懷疑艾斐得的朋友順手牽羊，偷走了葛父的銀酒壺。文本透露希望樂土的和諧理念，抵擋不了物質因素的介入，也暴露種族之間心理上的互不信任。

事實上銀酒壺事件其實只是冰山的一角，若讀者仔細推敲，可以發現這個烏托邦原本就建立在種族與階級主義之上。例如芭芭拉視既是非裔又是勞工階級的艾斐得為「行善對象」(cause)，暴露階級優越感。她贏得「白小姐」(Miss B.) 的暱稱 (Jen, 1996: 132)，也凸顯周遭之人意識其膚色之白 (Blanco)。而葛宅傳聞擁有「地下鐵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的傳說，又喚回美國蓄奴時代不可言喻 (unspeakable) 的黑暗歷史。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假設艾斐得此一角色的寓言性：他在葛家豪宅由地下室逐漸自由行動，登堂入室，最後要求平權，具狀控告因被若夫歧視而遭開除的過程，彷彿是非裔美國人爭取身心解放、政治權力的縮影。每次交心暢談都是賽斯主導，這也致使不歡而散之後賽斯被指控為典型白人自由派，處處要表現「父愛式」(paternalist) 控制，不讓黑人有自主發言權 (Jen, 1996: 202)。若由性別觀點審思，葛家夏令營中具有發言權者幾乎都是男性，大部份是賽斯與其他男人的對話。再就依薇與艾斐得之間的關

係以及其他非裔男性對於依薇身體饑渴的眼光，顯露黑男視征服白女為重振雄風的心態；依薇對於艾斐得的迷戀也可從白女對於黑男性能力的過度想像模式審視。這些隱存的衝突與矛盾，正叩應美國現實社會中種族、階級與性別危險的平衡狀況。美國建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歷經蓄奴經驗、民權運動、女性主義等運動的挑戰，必須不斷修正。葛家夏令營的分崩離析，隱然為一國家寓言。就連眾人聚集的葛家豪宅也只是租來的居所，一旦葛父因商場鬥爭失業，宅邸就必須還回，家園不保。美國建在強佔自美洲原住民的土地上，若有不平，則有國家危機。失去了豪宅，葛家人尚可遷回原有的住處。若是美國分崩離析了，各個族裔又當何去何從？

葛家夏令營的解散代表任璧蓮對於諸如「彩虹聯盟」、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等跨族裔烏托邦的一種質疑。正如夢娜指出賽斯夢想的不實際：「如果人們住在沒有隔間牆的房子裡，會需要許多規則。你不能要求不設隔間牆，卻又要每個人真情流露。大家會得要求有規矩。他們得有公私兩種面貌」(Jen, 1996: 208)。即使外在的藩籬消除，只要內在的心理障礙猶在，對立的狀態——甚至自身為順應外界而自我分裂的公私雙面性格——仍然無法破解。在葛家夏令營中內心障礙是缺乏信任與政治及經濟權力的不平等。發起善行的「白小姐」芭芭拉一直懷疑會有人手腳不乾淨，銀酒壺的失竊只是證明了她一貫的疑慮。而這種疑懼根源於將一批社會階級各不相同的人同時置放在理想化的空間，試圖忽視彼此的差異。此處也可印證駱里山對於美國多元文化主義假平等的批判。她指出多元文化主義本著多元主義 (pluralism) 的民主教條，泯滅弱勢族裔之內與之間重要差異和衝突。多元主義強調美國文化為民主地域，任何的組成份子都可平等接收，都被平等的再現，同時卻以包容的承諾，收編異己、衝突及她者，掩飾實際存在的排他行為 (Lowe, 1996: 86)。聖璜 (E. San Juan, Jr.) 也對於多元文化主義多

有詬病。他指出退化版本的多元文化主義只會讓差異變成陳腔濫調，因此得以將「她者」同化成為虛構的團體，剷平一切階級、種族與民族性的矛盾衝突；而當前多元文化主義所略而不談的正是有色人種奮鬥的歷史 (San Juan, 2002: 7)。因此，在未能解決種族不平等的物質事實之前，要談多元或聯盟都只像葛家夏令營近乎辦家家酒的遊戲 (play house)，缺乏實質的政治功能。

因此葛家夏令營的烏托邦可謂嚐試種族融合失敗的實驗。文本中真正的混雜，來自任璧蓮對於族裔「變身」的玩弄。文本中人人之屬性都可能改變。華裔的夢娜可以選擇變成猶太人，非裔的娜娥蜜可以選擇變成中國人。最值得探討的例子則是夢娜的日本情人修門之多變。修門先是因為同為黑髮黃膚而被夢娜視為中國人；後來修門驗明正身為日本人，並轉而要求夢娜變成他的日本新娘。在此中、日族裔屬性之可流動性乃基於亞裔外貌的相似；亦即以外在容貌的符碼決定屬性。而修門對夢娜的要求也反映父權思想中認為女性的屬性應依附丈夫的傳統。爾後熱線中的修門則以豐富的地理知識塑造出旅行者的不定屬性，打破以前保守的形象，更使得夢娜迷惑不已，直到後來她才驚覺日裔熱線情人竟然是猶太男孩安迪 (Andy Kaplan) 與賽斯接力喬裝。此處任璧蓮以跨族裔撲朔迷離的變身，特意凸顯族裔屬性的想像性、表演性與扮裝性。¹⁵

在《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書評中，凱瑞 (Jacqueline Carey) 稱這種「變身」為族裔性扭轉，與文學傳統中「性別扭轉」(gender bending) 相似，而且文本中「變化目不暇給」(“an explosion of transformation”) (Carey, 1996: 16)。這些目

¹⁵ 誠如審查人指出，《夢娜》一書最大之創見，在其回到亞美屬性被創造出來的年代，不像其他華美作家一樣重複頌揚亞美族群的桂冠標記，而以一連串滑稽古怪的變身，凸顯亞美屬性的標籤性，進而解構、轉換、創造出更具顛覆性的族群認同。

不暇給的變化與扭轉，具現美國文化屬性的混雜，以及文化屬性的為「一個不斷建構／解構／重構的過程」（單德興，1994：21）。索樂思（Werner Sollors）指出傳統看待族裔性的前提是想像族群為自然、真實、恆定不變的單位，具有某些本質性的持續存在，重點則在於保存及延續族群的生存，因此強調「道地性」與文化傳承，恰好與現代及後現代脈絡中認為族裔是創造、建構出來的觀念相反（1989：xiii-xiv）。楊格（Robert Young）也指出文化混雜已成為當前弱勢文化質疑主流的語言（1995：24）；經由混雜會產生解構性的「雙重邏輯」，「將異化為同，將同化為異，但在方法上使同不再為同，異不再僅僅為異」（Young, 1995：26-27，此處參考李有成譯文）。任璧蓮在《夢娜在應許之地》就成功地以族群（屬性）之混雜質疑政治體制中異同對立、僵硬固定的屬性（如美國人口局[U.S. Census Bureau]的人種分類），同時也解構了文化道地性的迷思，批判主流僭用「局內人」（insider）的心態。

華美文學傳統中混雜屬性的主題並非全然原創。湯亭亭的《猴行者》以齊天大聖七十二變的法力作為雜化族裔性的比喻。¹⁶ 同樣以一九六〇、七〇反文化年代為背景的本，兩位主角夢娜與阿辛（Wittman Ah Sing）都在嚐試創造自己的族裔性。《猴行者》對於華裔及華埠的生活有生動之描寫，也反映出湯亭亭為早期廣東移民後代的背景。文本中呈現的是喬艾斯式（Joycean）青年藝術家個人主義式的尋求藝術突破以及（後）殖民屬性的定義，在湯亭亭自道的「奇

¹⁶ 張小虹採用後現代屬性及雜種主體理論對《猴行者》的精彩評論，幾乎也可用於詮釋《夢娜在應許之地》：「它〔《猴行者》〕的雜尤在於遊走族裔之間與之內，不讓任何文化定義僵化為刻板模式，不讓任何差異單一化、穩定化為可供歧視與壓迫之辨識標準，使得族裔認同永恆擺盪於國家、文化、性別之間與之中。它的雜更在於重新思索調和、抗爭、雜種、異質之政治運用，重新思考認同／差異、前族裔／後族裔（pre-ethnic/post-ethnic）、同質／異質、回歸／創造二元對立模式之內與之外的轉換空間」（1994：56）。

特幽默感」(a quirky sense of humor)之下，掩蓋不住阿辛作為弱勢族裔男性及掙扎中的藝術家之挫折與憤怒，只有憑藉觀音這位母性敘事者的法力才鎮壓住阿辛這暴跳如雷的齊天大聖，神話的思維大半圍繞中國傳說。最後阿辛的大戲在舊金山華埠上演，不但繼續早期華裔移民遊／唱戲的傳統，也將文本中不斷向外擴張的能量凝聚在華埠以及這一齣涵蓋古今、包羅萬象的戲劇上。誠如史密斯(Jeanne Rosier Smith)所言，阿辛是個既是小丑也是救贖者的猴兒變形者(trickster)。他集結了新的美國社群來參與大戲的演出，以此戲向種族主義宣戰，並讚揚社群為治療種族主義之傷痕的場域(1997: 49)。

《夢娜在應許之地》沿用《猴行者》混雜屬性的敘事，以猴行者式的奇特幽默為師，加入青春少女式的輕鬆幽默，經由不斷的與周遭人物互動，探討嚴肅的文化政治議題。文本中的神話基礎，來自舊約式對於代表家園的應許之地的追尋，也是美國重要之立國神話，充滿對於新世界的期許。¹⁷ 而且夢娜的世界基本上與華埠沒有交集。雖然斯卡斯海爾仍是「有許多熟食店」(many-deli)的猶太住宅區(Jen, 1996: 3)，為「黃蜂」(WASP)仲介所不值，但是讓角色走出華埠，不但反映華裔新一代移民的生活形態，探索所謂的「模範弱勢」(the model minority)之迷思與遷入郊區「應許之地」之後的遭遇，也探討建立美國新社群之可能。更重要的是《夢娜在應許之地》也利用變形者位處社群邊緣、挑戰既成現狀與分化既有界域的特性(Smith, 1997: 2)，進一步書寫跨越族裔之間的變身可能，例如

¹⁷ 「應許之地」的觀念在文本中有不同層次的運作。應許之地雖然為移民美國的各民族提供希望，但是對於女性及美國弱勢族群而言，卻也充滿矛盾與衝突，例如安婷(Mary Antin)的自傳《應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顯示出猶太女性在美國的處境，夢娜的「變身」猶太人，也有改寫此一猶太經典作品之意。對於非裔歷史而言，應許之地則是北方的非奴隸州，在文本中也以「地下鐵路」一節影射之。

修門此一角色的多變、或是夢娜的猶太身份。因此《猴行者》與《夢娜在應許之地》的關係是延續性的，而後者則由不同的神話基礎、階級意識以及族裔背景開拓更另類的敘事領域。¹⁸

誠如任璧蓮在與單德興的訪談中言道，她書寫《夢娜在應許之地》主要在於打破身處宰制文化中不同族裔互不了解的盲點：

這本書是關於當出身、族裔被定位為「新猶太人」(New Jews)時，「華裔美國人」真正的意義到底如何？我的角色便是「猶太人」。在某些方面我想我跨越了那條界線，但並不是說每個華裔美國人在那種情況下都必然是猶太人，而是以某種方式去看跨越了那條界線後發生些什麼事、去思考那條界線、去思考族裔、去思考其他民族有可能成為猶太裔此一事實、去思考華裔美國人在何種情況下該成為猶太裔，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的認同——那就是我的意思。你認為自己的認同是固定的，而別人的認同是浮動的、多重的。(單德興，1997: 173)

這種跨越種族疆界的書寫，充分表現任璧蓮敘事中「語調的複雜性 (tonal complexity)」(單德興，1997: 160)及其反本質論的立場(單德興，1997: 173)。同時也更加凸顯位處華裔世代縱軸與種族雜混之同輩橫軸的夢娜在屬性認知上於不同座標位置之遊走與不可定性。

任璧蓮也善用夢娜的「雜性」批判白人社會賦予弱勢族裔「道地性」的壓力。任璧蓮的技巧是嘲弄主流對道地性的殷殷需求及弱勢的急切供應，因此在她的輕鬆筆法下無人倖免。例如夢娜剛轉學時，為了受人注意，鎮日以僅有的中文辭彙——「別發瘋」(*Byeh fa-foon*)、「稀飯。醬油」(*Shee-veh. Ji-nu*) (Jen, 1996: 5)——展示

¹⁸ 如審查人所言，修門的變身歷程緊扣書首的三段引言，顯示變身經驗之於史有據與跨越族群。而任璧蓮不同於湯亭亭之處，在於任創造了混血變形者 (mixed-blood/crossblood tricksters)，打破華美二元論述，使得變身/變形成為象徵層次跨越族群的屬性再造。

她的道地「中國性」(Chineseness)，並且四處應邀品嚐鑑定白人主婦的中國菜是否道地(Jen, 1996: 6)。為了增加「中國」的煽情性，夢娜還搬出吃猴腦的故事，根據自己的想像詳加解說渲染(Jen, 1996: 8)。夢娜所藉以建立自身道地中國性的語言與文化細節，正是黃秀玲所謂的「道地性指標」(“markers of authenticity”) (Wong, 1995: 187)。¹⁹ 任璧蓮卻自我解構筆下的「道地性指標」。例如當夢娜初遇同是亞裔面孔的修門，她依然祭出上海方言式的「醬油」「稀飯」試圖與其溝通(Jen, 1996: 10)，暴露自身中文字彙之有限，使得道地的指標反倒轉而標示她已混雜的屬性。

文本中的族裔扭轉與混雜更是對於道地性的挑戰。例如凱莉聲稱「直到她遇見娥娜蜜，她才了解什麼是做中國人」(Jen, 1996: 168)。她受到娥娜蜜的影響開始學習太極、中文。夢娜也發現娥娜蜜的中國菜令人大開眼界，嚐過娥娜蜜尊古法薰製而成的樟茶鴨，夢娜也報之以李，拿出海倫用百事可樂製成的北京烤鴨(Jen, 1996: 186)。此處食物的互響，顯示道地性並非專屬，非裔可以教華裔如何做中國人、做傳統中國菜；而雜化的中菜也不差，也是因地制宜的發明。任璧蓮仍然重視家庭親緣，卻也反對生物血緣的決定論。正如娥娜蜜告訴凱莉別管父母，自己可以選擇祖先(Jen, 1996: 129)。此類宣言一方面表現知識份子的驕傲與反動，一方面也呈現屬性的自由流動。而夢娜因信奉猶太教改姓「張格維茲」，這種改姓的革命行動，正如《典型美國人》中的「張基」一樣，是再造屬性的具體表現。²⁰ 不同之處在於「張基」是向主流同化的選擇；而「張格維茲」雖然也是由「有色人種」跨入白人族裔範疇，但是選

¹⁹ 黃秀玲指出譚恩美的作品中令白人評者極為激賞之處在於大量提供有關中國似是而非的細節，作為其文本「道地性指標」。其功能為建造一種「東方主義的效果」，使得文本與美國所想像的東方互相吻合。

²⁰ 劉紀雯稱「張基」是一種費斯克(John Fiske)式的「再創造」(1996: 118)。

擇的是白人中的少數民族，路線仍是邊緣化行徑，卻又弔詭地符合民權風潮的時髦風尚。「張基」與「張格維茲」之相同代表張家兩代創造華美屬性的共同決心，而其相異之處則象徵不同時空下兩代對於應許之地不同的期盼。文本末尾夢娜認為與賽斯婚後全家應該改姓為「張格維茲」，不但顛覆妻隨夫姓的傳統，具有革命性反主流的觀點，肯定她少年時代「變身」的決定，也反應夢娜與賽斯跨族裔婚姻與愛娥 (Io) 血統之混雜。愛娥的誕生，不但跨越黃／白、亞／美的種族疆界，打破反對異族通婚的純粹血統迷思，更代表新美國人的新血統。²¹ 因此如果《典型美國人》訴說的是「一個美國故事」(Jen, 1991: 3)，處理族裔作家經常使用的移民題材，《夢娜在應許之地》記述的是另一世代如何試圖打破種族之間的藩籬，創造新美國的故事。

然而道地性與屬性的自由流通也有其危險：主流社會可以視道地性為原始資源而僱用或挪用之，再以「局內人」的身份，使得弱勢族裔遭到「第三世界化」。例如夢娜在羅德島遇到的英格 (Ingle) 一家，就是此類主流人士的代表。英格太太一再追問夢娜「從哪兒來的」，並且不接受夢娜也是來自紐約，與艾露易絲是同學的答案 (Jen, 1996: 181)。而且英格太太堅持與夢娜討論中國藝術：

夢娜對此一竅不通，而英格太太則瞭若指掌，這一點是在夢娜發表高見時不經意地表露出來。英格先生的專長則是共產主義。他與夢娜討論韓戰，認定她知道什麼是北緯三十八度線。他討論香港及福爾摩沙——至少夢娜知道現在那兒叫台灣。

「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英格先生想要知道。

(Jen, 1996: 182)

²¹ 任璧蓮與白人丈夫的跨種族婚姻也產生歐亞混血的兒子。愛娥的角色極為可能是自傳性；而任在文本中賦予愛娥的希望，也可視為一種心理的投射。

這種強將弱勢族裔她者化、異國化，而同時又要表現掌握她者本質的局內人主義，明顯的表現主流社會的殖民心態。任璧蓮則報之以反諷：讀者早由猶太青年團契的聚會知道艾露易絲的亡母是猶太人 (Jen, 1996: 55)，雖然她後來決定還是做「黃蜂」(Jen, 1996: 56)，反而凸顯美國盎格魯—撒克遜後裔血液的混雜，甚至包藏諸多種族瞞混 (passing) 的歷史。

筆者認為芮德哈卡山南 (R. Radhakrishnan) 所屬意的道地性極為適合形容《夢娜在應許之地》：「道地性是一種創造，具有足夠空間可以容許多方紮根 (multiple rootedness)；也就是說在道地性與歷史偶發性、道地性與混雜性、道地性與創造性之間，毋須存在理論或知識論上的相對性」(1996: 162)。或者也如李有成指出：「在各種抗爭對立的喧囂當中，道地特質也將自身轉代為一個可供強勢與弱勢族群雙方協商文化屬性的交會場所——也許是巴巴 (Homi Bhabha) 所謂的『第三空間』——以解除文化再現中的二元對立結構」(1997: 104)。

芮德哈卡山南與李有成的族裔政治都指向化解族裔之間相互對立，並製造協商與關聯性。此處筆者要引用費德曼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為女性主義勾勒之「關聯性」敘事 (relational narratives) 做為《夢娜在應許之地》所展現的屬性藍圖。費德曼指出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北美女性主義論述在種族與族裔性的衝擊下，相繼出現否定 (denial)、指控 (accusation)、懺悔 (confession) 與關聯性位置 (relational positionality) 等不同敘事，而前三者都局限於黑白交戰的二元思維 (1995: 7)。冒現於一九八〇年代的關聯性敘事則「認為屬性是視情境而建構與定義，而且必須在不同系統的她者性與層理間抉擇」(“regard identity as situationally constructed and defined 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different systems of alterity and stratification”) (Friedman, 1995: 17)。此類關聯性的敘事對於華裔美國論述以及其

他非白人主流或非裔論述極具深意。由於美國特殊的歷史背景，討論種族問題時，往往只見白、黑兩色人種，其他人種往往遭到忽視或重疊邊緣化，即使在種族論述中都默然無聲。然而亞裔美國人及其他弱勢族群在美國的最大意義就是抗拒主導典範 (the dominant paradigm)。亞裔使得美國屬性重新定義，超越僅有黑與白的狹窄觀念及國族思想 (Okiihiro, 1994: 155)。

這種關聯性的敘事倡導新的「聯盟政策」(“coalition politics”) (R. Radhakrishnan, qtd. in Friedman, 1995: 40), 但不同於葛家夏令營的彩虹聯盟。因為關聯性敘事不是想溝通固定的差異，而是超越純 / 不純及壓迫者 / 被壓迫者的絕對範疇，以全球性觀點，處理在中不同族裔時享特權、時受排斥的位置所造成的定位 (location) 問題 (Friedman, 1995: 40)。《夢娜在應許之地》中呈現此種對於種族、階級與性別不同定位的複雜思考。如果亞裔受到主流社會的歧視，若夫對於「非我族類」的不信任使得他複製主流的種族主義；猶太人或許因為白種膚色可以享有某種特權，然而在白人主流社會需要代罪羔羊時，這個白種人中的弱勢族群依然首當其衝，如芭芭拉位居高級主管的父親被公司無情開除，甚至還無法以歧視名義控告公司 (Jen, 1996: 237)。若說《典型美國人》的認同策略是「加入式的 (participatory) —— 加入並重新定義美國國家主體」(劉紀雯, 1996: 106)，《夢娜在應許之地》則是建立關聯式的屬性，提供跳脫二元對立的宏觀，鼓勵讀者由種族、階級及性別之相互關聯性，思索家庭、社會、國家中不同權力之配置。

參、結論

筆者以為任璧蓮最成功的策略，就是選擇以喜劇的方式展現複

雜的關聯性思維。此處喜劇的定義異於傳統戲劇的定義。²² 任璧蓮文本的喜劇性不只是筆調的輕鬆，而是以幽默來整理面對憤怒時的情緒，以便能更有條理地呈現故事的全貌(Lee, 2000: 225)，這是她避免面對種族主義時產生暴怒反應的方法。她的喜劇書寫也應該屬於精神層面，對於未來抱持著希望，總在最晦暗的時刻峰迴路轉。或許現實世界的應許之地與神話的允諾不盡相同，而且現實中的許多問題也未必都能解決，但是仍然有希望。《夢娜在應許之地》常將嚴肅的主題隱藏在笑聲之後，當情節朝悲劇路線發展，又會柳暗花明。例如芭芭拉後來發現偷銀酒壺者另有其人，誠心向艾斐得及他人致歉，得到某種和解，也使艾斐得不再控告若夫種族歧視，對建立種族之間的關聯性寫下正面的註腳。又如文本中有一幕是夢娜被母親掌摑之後離家出走，在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時突然感到置身伊甸園：

僅管憂慮的風依舊吹襲，但在陣風之間，她可以感覺到——她甚至不只是站在伊甸園內，好像她就是伊甸園。一個即使在可憐的魔鬼被放逐後仍是永遠陽光普照的地方。她覺得自己似乎站在時間的開端。後顧無歷史，前面是一切。太自大了！**好像妳沒娘似的！好像妳是憑空蹦出來似的！**她可以聽到海倫的聲音。但是夢娜仍然可以感覺到——她的內心舒展開來，有如火車站一樣大，有著川流不息的燈光。(Jen, 1996: 255)

夢娜有如即將遭放逐的夏娃，但是卻不因無家可歸而自憐。在克服最初的疑懼後，她反而與身旁睡著的流浪婦人產生感情之交融，不但讓這個陌生人把腳放在她的膝上，甚至為了不讓沈睡的婦人跌落而抱緊她的腳踝(Jen, 1996: 256)。雖然在此段內心獨白中出現母親

²² 任璧蓮自己也曾釐清喜劇形式與無憂無慮(lightheartedness)的喜劇語調。她不以為她的作品屬於結尾時皆大歡喜、問題迎刃而解的喜劇形式，她的作品中應該表現複雜的悲喜交加(tragic-comic)語調(Matsukawa, 1993: 119)。

斥責之聲，使得夢娜的伊甸園不盡完美。但是任璧蓮所描寫的應許之地是墮落之後的(postlapsarian)人間樂土，在此蹺家的亞裔女孩對無家可歸的白種婦人可以產生憐惜，伸出援手。夢娜這種跨越種族與階級的關懷，製造人際可貴的關聯性，也具現文本中的喜劇視域。²³

這種來自對人性的了解與包容的喜劇視域，可謂任璧蓮對於創新華美女性文學傳統的貢獻。蕭華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中，經由女性主義出發，提供次文化與文學的傳統演變模式：由**模仿**、**內化**主流傳統，到**抗議**主流標準及價值，**倡導**弱勢權利及價值，最後轉向**自我發現**，不再依賴對立性而尋求自己的屬性(1982: 13)。這個概括的模式固然約化簡略，但仍然可以幫助讀者釐清華美女性文學傳統。由早期如黃玉雪對於主流文化的認同，到一九七〇年代對於種族、性別不平等的抗爭，以及以母女世代傳承的方式表達族裔文化的持續，華美女性文學已經進入自我開創、發現的時期。《夢娜在應許之地》則帶給華美女性文學創新的契機，提供創造另類族裔屬性的可能。任璧蓮的才華是在尊重傳統之餘也表達其特立獨行的個性與看法。除了同其他華美女性文本一起關懷性別議題，也討論階級與族裔問題。

²³黃秀玲在研討會的論文中對於中央車站这一幕有不同解讀，認為夢娜無法處理真正貧困無依的現實，而流浪婦人也是警示性人物("a cautionary figure") (黃秀玲, 1997: 17)。誠然任璧蓮筆下基本上反映華裔新移民的中產階級意識，迥異於湯亭亭筆下所再現的早期移民之勞工生活形態。《夢娜在應許之地》結尾時也一一交代角色的出路，似乎幾乎每個人都在中產階級中覓得迦南聖地。黃秀玲也指出結尾時缺漏未提的角色也是屬於非裔下層階級(underclass)的人物(1997: 20)。但是否任璧蓮在文本中所營造的只是向上爬升(upward mobility)的中產階級天堂？文本中卻有其階級意識之局限，但夢娜能夠伸手抱住流浪陌生婦人的姿態，以及艾斐得與依薇的黑白跨族婚姻(雖然他們也「翻身」進入中產階級)，都顯示任璧蓮的確有心描寫種族與階級的跨越及其可能性。審查人也指出任璧蓮是用喜劇式的反諷語氣，表達美國社會、階級的複雜性，以及族群屬性的建構性與荒謬性。

文本結尾交代角色現狀，鏡頭焦點則是海倫、夢娜以及第三代的愛娥：夢娜與母親交換至死不渝的誓約，而鼓掌叫好的愛娥則是盟約的見證(Jen, 1996: 304)。夢娜所尋到的應許之地是跨越世代與種族的母系空間，而任璧蓮則在《夢娜在應許之地》中藉由處理母女、姊妹之間以及不同族裔與階級縱橫交錯的互動，將慣常出現的世代情節與族裔論述、階級差異結合，加上遊走不定、充滿族裔變身的橫向社群，從而提出種族之間互相關聯的喜劇視域，為華美女性文學再創新的傳統。

參考文獻

- 李有成(1997)。論道地：《郊野佛陀》中的文化政治，〈中外文學〉，25, 9: 104-120。
- 張小虹(1994)。雜種猴子：解／構族裔本源與文化傳承，單德興、何文敬(主編)，〈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頁 39-60。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單德興(1994)。析論湯亭亭的文化認同，單德興、何文敬(主編)，〈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頁 1-24。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單德興(1997)。任璧蓮訪談錄，〈中外文學〉，25, 11: 157-174。
- 黃秀玲(1997)。“But what is an Asian American?: Culture, class, and invented traditions in Gish Jen’s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創造傳統：第三屆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劉紀雯(1996)。車子、房子與炸雞：《典型美國人》的大眾文化與國家認同，何文敬、單德興(主編)，〈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頁 105-131。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Bow, L. (1994). Cultural conflict/feminist resolution in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In F. Ng, et al. (Eds.), *New visions in Asian American Studies: Diversity, community, power* (pp. 235-247). Pullman, WA: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arey, J. (1996, June 9). Switch.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p.16.
- Friedman, S. S. (1995). Beyond White and other: Relationality and narratives of race in feminist discourse. *Signs*, 21, 1: 1-49.
- Hobsbawm, E., & Ranger, T.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n, G. (1991). *Typical America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Jen, G. (1996).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Kingston, M. H. (1976).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New York: Vintage.
- Kingston, M. H. (1989).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New York: Vintage.
- Lee, R. (2000). Gish Jen. In K.-K. Cheung (Ed.), *Words matter:*

- Conversations with Asian American writers* (pp. 215-232).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Li, D. L. (1992).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tradition: Displacing American Orientalist discourse. In S. G.-L. Lim, & A. Lim (Eds.),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 (pp. 319-332).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im, S. G.-L. (1993). Feminist and ethnic literary theories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eminist Studies*, 19, 3: 571-595.
- Ling, A. (1990). Chinese American women writers: The tradition behind Maxine Hong Kingston. In A. LaVonne B. Ruoff, & J. W. Ward (Eds.), *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pp. 219-236). New York: MLA.
- Ling, A. (1991). "Emerging canons"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rt. In S. Hune, et al. (Eds.), *Asian Americans: Comparative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pp. 191-197). Pullman, WA: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Lowe, L. (1996).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atsukawa, Y. (1993). MELUS interview: Gish Jen. *MELUS*, 18, 4: 111-120.
- Ng, F. M. (1993). *Bone*. New York: Hyperion.
- Okihiro, G. Y. (1994). *Margins and mainstreams: As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Radhakrishnan, R. (1996). *Diasporic mediations: Between home and loc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an Juan, E., Jr. (2002). *Rac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Critiques of multiculturalist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atz, M. (1993). Writ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are dangerous: A conversation with Gish Jen. *Southwest Review*, 78, 1: 132-140.
- Showalter, E. (1982).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New Rev. ed.). London: Virago.
- Smith, J. R. (1997). *Writing tricksters: Mythic gambols in American*

- ethnic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ollors, W. (1989). Introduction: 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 In W. Sollors (Ed.), *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 (pp. ix-x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n, A. (1989).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Ivy Books.
- Tan, A. (1991). *The kitchen god's wife*. New York: Ivy Books.
- Tan, A. (1995). *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 Wong, S. (1995). "Sugar sisterhood": Situating the Amy Tan phenomenon. In D. Palumbo-Liu (Ed.), *The ethnic canon: Histories, institutions, and interventions* (pp. 174-21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oolf, V. (1945).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8)
- Young, R. (1995).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Routledge.

**Reinventing a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Tradition in Gish Jen's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Pin-chia Feng

Abstract

This paper places Gish Jen's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fictional texts and examines the ways in which Jen playfully reinvents a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tradition. With an inclusion of a mother-daughter plot in the novel, Jen dutifully constructs a vertical (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which is one of the typical thematics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Yet Jen also inventively creates a horizontal community for her protagonist Mona, in which racial, class, and gender boundaries are deliberately overlooked. The dissolution of such a utopian hybrid community nevertheless questions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kind of solidarity. Moreover, through the multiple "switches" of identity of her characters, Jen undermines the essentialist fixture of racial authent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insiderism. Finally, with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ona and her mother and the birth of Mona's Jewish-Chinese American daughter, I argue that Jen is consciously (re-)inventing a comic tradition for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through which she may at once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matrilineage and introduce a politics of relationality that goes beyond racial confines.

Key Words: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women's literary tradition, politics of relationality, 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